

李彬、聂宏毅，“中美战略稳定性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13-19页。

Analysis on the Strategic Stability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 Li Bi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 Nie Hongyi,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e U.S.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weapons is bringing new uncertainties to the strategic stability between China and U.S. On one hand, the uncertainties could increase the interest of the U.S. decision-makers in nuclear coerc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certainties could force Chinese decision-makers to reserve large flexibility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capability. A nuclear taboo is critical to maintain the strategic stability between China and U.S. and the taboo is facing some marginal challenges. China and U.S. have built mutual trust in nonproliferation cooperation but still need better communication.]

[Key Word: nuclear weapons, strategic stability, nuclear taboo]

中美战略稳定性的考察

李 彬 聂宏毅

【内容提要】 美国近年来的战略武器调整与发展给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有可能加大美国决策者对核威压的兴趣，另一方面可能迫使中国决策者为未来战略能力发展预留更大的余地。核禁忌对于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性关系重大，但是目前受到了一些边缘性的挑战。中美在不扩散等合作中建立的互信有助于双边战略稳定性，但仍需加强沟通。

【关键词】 核武器；战略稳定性；核禁忌

【作者简介】 李彬，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聂宏毅，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08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00 (2008) 02-0000-08

一 引言

当前，中美关系的内涵非常丰富，双方既有合作又存有疑虑。对这种复杂关系应该如何描述？战略武器在这种关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目前，中美之间时断时续地进行着战略武器领域的官方、学术以及半官方对话。为使这些对话更富有成效，双方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共同认可的、可操作的指导原则，以指导双方探讨合作性的手段，在战略武器领域澄清疑虑、解决分歧、增进稳定。

冷战期间，为了处理美、苏之间的战略武器关系，安全专家们建立了一套指导原则，称做战略稳定性理论，或称经典军备控制理论。经典军备控制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战略稳定性，包括危机稳定性与

军备竞赛稳定性两个元素。这个概念用来考察双方战略力量对比对两个国家关系的影响。^①冷战时期及冷战结束之际，美、苏（俄）之间重要的战略武器谈判、倡议以及相关学术讨论无不以战略稳定性作为核心指导原则。可是，经典军控理论中的战略稳定性概念无法直接应用于中美关系这一框架，其主要原因在于，冷战中大体对等的两极格局已经成为过去，而建立在大体对称格局下的战略稳定性概念难以描述非对称格局下的稳定性问题。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等人于1998年提出了一般性的攻防理论，测量一般情况下武器格局对战略稳定性的影响。^②一般攻防理论与经典军控理论的理论基础是一样的：都是以安全为目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以物质性的实力结构作为计算依据（结构现实主义）、都认定通过军控实现合作性安全是可能的（乐观现实主义）。一般攻防理论的思路如下：第一，将一方作为进攻方、另一方作为防御方，可以根据攻防双方的费用之比来考察单向攻防对比。第二，如果决策者认为进攻占优（对应于进攻成本低，相当于经典军控理论中的战略失衡），则出现进攻行为（战争）的可能性大。我们以此作为出发点来考察中美在战略武器领域的战略稳定性。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两条思路的具体推论如下。第一，我们考察美国作为进攻方的攻防对比（战略失衡）。第二，如果美国决策者认为美国战略武器的优势越大，则发动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可能性越大。

一般攻防理论与经典军控理论一样，都假定国家完全按照利益的大小选择它们的行为。这与战略武器领域的现实并不完全一样。经典军控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陷入不利的战争局面而又不断担心核报复的时候，它发动核打击来挽救战局的可能性就很大。可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都显示这种预测没有反映国际社会的真实情况。建构主义理论中的核禁忌理论认为，国际社会存在着一种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国际规范，这种规范被称做核禁忌。^③在核禁忌有效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拥有先发制人核打击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实施这种核打击。可是，即便存在核禁忌，也不能阻止核武器国家利用核武器优势进行威压（coercion）。因此，战略失衡所带来的最直接作用在于核威压。考虑到核禁忌的作用，我们将上述研究思路中的第二条修改如下：如果美国决策者认为美国战略武器的优势越大，则美国使用威压手段的可能性越大。核战争的危险并不直接来源于核优势，核战争的危险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1）核禁忌受到损害而使得核战争危险增加；（2）由于误判而出现核战争。

在上述的理论与现实考虑下，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战略稳定性分析框架，用来分析战略武器领域的中美战略稳定性。新的战略稳定性包括以下四个元素：

第一，一个国家将核优势地位转化为核威压手段（coercive privilege）的程度，这相当于经典军控理论中的危机稳定性。所不同的是，经典军控理论认为战略失衡的结果是核战争危险上升；本文则认为战略失衡的结果是核威压的危险上升。我们将考察美国战略力量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是否增加美国对中国实施核威压的本钱。

第二，不同国家战略武器发展的正关联程度，这相当于经典军控理论中的军备竞赛稳定性。所不同的是，经典军控理论仅仅关注由于安全防范心理导致的负面军备互动，本文还关心由于模仿行为而导致的军备发展正关联。我们将考察美国战略力量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是否引起中国战略力量的相关发展。

第三，核禁忌的牢固程度。一个强有力的核禁忌是避免核战争的有力手段，对核禁忌的损害会增加核战争的危险。我们将考察核禁忌所面临的挑战。

^① 李彬：《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66-88页。

^② Charles L. 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1988, pp. 44-83;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1998, pp. 5-44.

^③ Richard Price and Nina Tannenwald, "Norms and Deterrence: The Nuclear and Chemical Weapons Taboo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4-125.

第四，核武器国家之间互信的程度以及危机中沟通的顺畅程度，这是避免误判而导致核战争的重要因素。我们还将对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的状况与沟通渠道进行分析。

表 1 新国际格局下战略稳定性的构成

元素	内容	含义	经典军控中的对应项目
1	战略失衡	进行核威压行为的本钱	危机稳定性
2	战略武器发展正相关	战略军备竞相发展的可能性	军备竞赛稳定性
3	核禁忌牢固程度	有意发动核战争的危险	无
4	战略互信与沟通	避免核误判的能力	无

按照经典军控理论以及一般攻防理论，战略平衡的考察只关注战略力量本身的结构与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一定是真实的能力，它是决策者所认定的能力。^①对战略平衡的考察不关注战略力量部署者的意图，也就是说不关注部署的战略力量是针对谁。在美国 2002 年《核态势审议报告》中提出，^②美国将建成新三位一体的战略力量结构。新三位一体包括：核战略和常规的进攻性战略打击力量、导弹防御能力以及随时扩大核力量的后备能力。发展常规的进攻性战略打击力量是对核禁忌的一种损害，进攻性核战略打击能力发展所针对的重点是机动目标。为了打击机动目标，美国需要远程导弹以及全球性的对机动目标的快速探测能力。潜射导弹由于飞行时间短，比洲际导弹更适合攻击机动目标。在过去的十多年，美国一方面裁减远程导弹的总数，另一方面将核潜艇逐渐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我们考察的重点有三个方面：（1）美核潜艇东移可能对中国机动导弹的生存能力构成威胁；（2）美国为建立全天候的对机动目标的快速监测能力正在研究外空雷达；（3）新三位一体中的导弹防御和随时扩大核力量的后备能力。维持这种后备能力的一个具体措施是维护核武器试验室的研究与生产能力。

二 美国战略武器动向与战略失衡

美国战略武器发展是否会加剧中美之间的战略失衡，这种失衡是否可能成为美国进行核威压的本钱，这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目前，中国正在通过提高战略核力量的机动性来保障中国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在美国战略武器动向中，有三个方面的调整与动向可能损害中国核力量生存能力并导致战略失衡，它们是美国核潜艇东移、美国导弹防御发展及美国外空雷达发展动向。下面分别给予具体讨论。

（一）美国核潜艇东移

美国携带潜射导弹(Submarine 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 SLBM)的核潜艇原本主要部署在大西洋。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间，美国一方面更新其核潜艇，另一方面将携带潜射导弹的核潜艇转移到太平洋。美国海军已决定把绝大部分弹道导弹核潜艇转移到太平洋，以增加瞄准中国的目标数。^③这些核

^① Charles L. 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pp. 44-83;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 of War," pp. 5-44.

^② Ronald H. Rumsfeld,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Jan2002/d20020109npr.pdf>, "Nuclear Posture Review [Excerpts]," 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policy/dod/npr.htm

^③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U.S. nuclear forces, 2007,"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63, No. 1, 2007, pp. 79-82.

潜艇可携带核弹头数量达上千枚，因此，美国核力量向东的调整幅度是巨大的。用潜射导弹来攻击陆基机动导弹有一些技术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在于，抵近发射的潜射导弹飞行时间短，这段时间里面陆基机动导弹的机动范围就小一些，潜射导弹攻击效率就高一些。单纯从数量上来看，美国在太平洋中的潜射导弹能够攻击数百枚地面机动目标，前提是美国能够发现并定位这些目标。如果美国不能在机动目标的探测与定位上有实质性技术提高，美国部署在太平洋中的这些潜射导弹并不能提高美国先发制人核打击的能力。也就是说，美国核潜艇东移毒化了中美战略关系，对中美战略平衡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这一潜在威胁能否变成现实威胁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建立全天候的对机动目标的快速探测能力。

（二）美国导弹防御的发展

导弹防御问题曾经是中美之间讨论的激烈话题。布什于 2001 年执掌政权之后，美国政府一度采取了不同中国讨论军控问题的政策，双方就导弹防御问题的讨论因此就沉寂下去了。随着美国政治气候的变化，双方就反导问题进行一些讨论的余地有所增加。理论上，美国即使部署一个拦截器数量极其有限的反导系统，也可能削弱中国的核报复能力。中国少量增加进攻性核武器的数量于事无补。其原因在于，美国核武器数量相对于中国有巨大优势，中国增加的核武器数量仅可用来吸收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只有生存下来的极少量核武器才能用于导弹突防。因此，美国并不需要很多拦截器就可以抵消中国的核报复能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正在发展的地基动能反导系统的实战能力值得怀疑，其主要缺陷在于这一系统的探测识别能力不能满足需要，尤其是面临对方选择恰当的突防措施，导弹防御的效能更不可靠。^①关键问题在于反导系统的拦截范围是一个容易估计和理解的物理量，而该系统实战中的拦截概率却是一个难以事先考察和评估的量。因此，即使一个实战中不可靠的反导系统也可能会给美国决策者带来误导，使得美国决策者以为美国已经拥有更为强大的战略优势，从而盲目采取核威压政策。

（三）外空雷达的发展

中国战略导弹机动性的增强提高了中国核武器的生存能力，从而维持了中美战略稳定性。如果美国不接受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状态，它单纯增加瞄准中国的核武器数量（例如，核潜艇东移）并不能达到目的，必须增加其探测、识别和跟踪机动目标的能力。美国卫星上的红外与可见光探测器可以部分地服务于这一目的。可是，在多云和雨天，红外与可见光探测器就无法透过云层看到地面目标。为此，美国希望发展全天候的对地面监测能力。其具体方案就是发展卫星上的对地雷达，运用多普勒效应来跟踪地面机动目标。按照这一设想，美国将在 2008 年开始部署一个外空雷达网络。^②如果美国外空雷达能够有效实现其设想的功能，就能够全天候地探测、识别和跟踪体形巨大的中国战略机动导弹。这样，中国战略武器机动化的努力就白费了，中美之间就会出现新的战略失衡。分析表明，^③只要中国选择恰当的应对措施，外空雷达将难以对中国战略机动导弹进行全天候跟踪，因此，并不能实质性地降低中国的核报复能力。问题是，外空雷达对地面机动目标的探测能力是一个动态的结果，随着环境（如地势）、地面目标机动路线等不断变化。因此，一旦美国部署了外空雷达，中国就不容易知道自己的机动导弹是否正被对方跟踪；美国也不容易知道它正在跟踪的中国机动导弹是否已经摆脱了跟踪。这会增加双方决策的难度。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在战略武器方面已有的调整、正在部署的系统以及逐步发展的新技术并不一定能有效地抵消中国的战略报复能力。可是，这些系统中的一些技术能力不够明晰，因此，可能会给美国决策者错觉，以为美国具备了这种能力。例如，一些美国学者认定，美国已经可以依靠先发制人

^① Andrew Sessler, et al., "Countermeasures: A Technical Evaluation of the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the Planned U.S.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System," MIT/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April 2000.

^② The Space and Missile Systems Center, "Fact Sheet: Space-Based Radar (SBR)," http://www.losangeles.af.mil/smc/pa/fact_sheets/sbr.htm.

^③ Li Bin, "Tracking Chinese Strategic Mobile Missiles," Science & Global Security, Vol.15, No.1,2007, pp.1-30.

的核打击完全摧毁中国的远程核武器，由此美国已经拥有了对中国进行核威压的资本。^①

三 战略武器发展的正相关

按照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观点，一个国家如果感觉到其他国家的武器发展给自己带来了不安全，本国就可能采取相应的自助手段来弥补。这就是经典军控理论中推测军备竞赛稳定性的思路。按照这一思路，我们简要分析美国战略武器的三个动向给中国战略武器发展带来的影响。

美国核潜艇东移增加了美国对中国核武器采取先发制人打击可使用的核弹头数量，提高了对已经探测到的中国陆基机动战略导弹的攻击效率。可是，中国核武器可以通过伪装加以隐蔽，中国的陆基机动战略导弹即使被发现还可以通过机动来重新隐蔽。因此，中国不一定需要通过增加核武器数量来应对美国核潜艇东移。但是，中国有增强核武器隐蔽性的需要。可以说，美国核潜艇东移增加了中国对增加核透明的顾虑。

从理论上讲，美国发展导弹防御会削弱中国的核报复能力。因此，中国势必采取措施来维持其核报复能力的有效性。从经济角度看，中国与美国竞相发展进攻导弹数量与拦截器数量是对双方都不利的一种结果。^②中国可以采取假弹头诱饵一类的低成本突防措施。如果中国采用这类突防措施，那么双方就不会出现战略武器数量竞争。问题是，由于各项技术具有不确定性，决策者未必能够清楚地预见这些技术长远的相生相克的关系。因此，面对美国导弹防御的发展，中国不得不多准备几手。这样，中国对战略导弹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就会出现更多的困惑。

由于中国核武器数量少，中国核武器生存能力势必依赖其隐蔽性，中国战略机动导弹的发展增强了其隐蔽性能，从而提高了生存能力。理论上，美国的外空雷达将给美国提供全天候的对机动目标的侦测和跟踪能力。为此，中国也有必要对此加强预防。从技术角度看，中国完全可能采用一些较低成本的手段来应对外空雷达对中国战略机动导弹的侦测。同样，技术不确定性往往会给决策者带来决策压力，使得决策者不得不留有余地。从中国国家安全以及世界安全的角度出发，中国以往将核武器置于较低的戒备状态。美国不断加强对其他国家核武器的侦测能力，这可能对中国的核武器低戒备政策构成压力。如果中国为了摆脱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的紧密跟踪而被迫选择核武器的高戒备状态，这实际上对美国安全也不利。

从直接的技术应对来看，中国可以采取成本较低的技术手段来应对上述的美国战略武器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压力。问题是，技术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也给中国对未来战略武器发展政策的选择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性包括：对核透明的承受能力可能下降，从而增加对核透明的疑虑；为了了解和储备各种突防技术，战略导弹的发展道路可能面临太多选择，决策难度增大；为了摆脱美国卫星的密切跟踪，继续保持核武器低戒备状态的难度增加。

防御性现实主义关于军备互动的思路是，一个国家发展军备可能削弱其他国家维护安全的能力，其他国家对此能力予以补偿而发展军备。这种现象被称做安全困境。实际上，安全困境只是一个国家对军备进行投资的原因之一。刺激一个国家对军备进行投资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发展本身。即使一项技术的军事前景并不明朗，有能力的国家往往也会进行技术探索，这样做至少可以避免在其他国家军事技术出现突破的时候措手不及。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当时的中美

^① 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End of MAD? The Nuclear Dimension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4, 2006, pp. 7-44.

^② 刘志伟:《中国通过增加洲际导弹数量应对美国全国导弹防御的经济效应分析》，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关系存在着某种事实上的同盟关系，而且美国当时还在对中国的一些军事技术发展提供一些援助。^①因此，中国方面不大可能将“战略防御倡议”看做是对中国的直接威胁而采取反制措施。可是，“战略防御倡议”当时被看做是一种科学技术发展的示范。王大珩等科学家因此向中国决策者建议，提出要跟踪这样的世界先进水平，由此诞生了中国的“863计划”。^②

目前，美国在战略武器领域有一系列的部署、发展与研究动向，其中的技术发展对全世界都在起着示范作用。美国正在进行一些技术研究，例如，导弹防御中的碰撞杀伤(hit-to-kill)技术、用于探测地面机动目标的外空雷达技术。这些技术可能会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而它们本身又是高新技术。中国肯定会对这些技术进行研究，找到应对措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同种高新技术能力也会相应增长。例如，中国于2007年1月11日进行的外空科学试验，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与美国目前正在发展的反导系统中的碰撞杀伤技术属于同一种技术。这就表明，只要美国开发新的战略武器技术，中国也会跟踪并掌握这种技术，并作为技术储备。美国的另外一些研究项目，例如，可靠替换弹头计划(Reliable Replacement Warhead, RRW)，它本身并未给中国带来直接的安全威胁。但由于美国在整个科技领域的带头作用，其他的核武器国家对美国的研究计划或多或少地会进行模仿。为了了解这些研究项目的含义、避免技术上的措手不及，中国肯定也会对这些研究项目进行跟踪研究。因此，从科技传播的角度看，美国的战略武器技术发展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跟进，由此出现战略武器发展的正相关。这种正相关的起因虽然不是安全困境，而只是一种对技术发展前景不确定性有所担心而进行的技术储备，但结果仍是战略武器发展的标线提高了。

四 核禁忌及其受到的挑战

核禁忌是反对使用核武器的社会态度，是一种国际规范，它具有预防核战争的作用，也是中国建立其核战略的一个重要依据。^③如果核禁忌受到损害，决策者对使用核武器的克制力就会下降，核战争的危险就会加大，中国面临的核危险也会增加。目前，对核禁忌的挑战来自诸多方面，为对抗这种挑战的努力也体现在各个方面。

(一) 核恐怖主义危险的增长可能损害核禁忌

核禁忌是一种国际规范，这种规范通过国际社会的交流与价值观共享得以维护。难以相信恐怖主义者会遵从这一国际规范。目前，核恐怖主义的危险在增长，人们对核武器不会被使用的信心也因此而下降。^④中、美在打击核恐怖主义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采用技术上的和制度上的措施来摧毁核恐怖主义的基础，降低核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这不仅可以减小核恐怖主义本身的危害，而且还可以增强人们对核禁忌的信心，从而维护一个对中美都有利的国际社会环境。这样，即使中美两国关系因为冲突而出现危机，核禁忌也可以帮助两国减小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猜忌，避免出现误判，从而减小核战争的危险。

目前，中、美两国都在采取措施，不给恐怖主义分子发动核恐怖袭击的机会，例如，加强核技术监管。^⑤两国也在推动一些国际合作，例如，达成和落实联合国1540号决议，防止非国家行为体核扩

^① Kenneth W. Allen and Eric A. McVadon, "China's Foreign Military Relations," A report by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Report #32, October 1999. p. 72.

^② 科技部863计划联合办公室：《国家863计划十五年综述》，http://www.863.org.cn/863_95/863briefing/863bif005_01.html。

^③ 李彬：《中国核战略辨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16~22页。

^④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Clock Timeline — It Is 7 Minutes to Midnight (2002)," <http://www.thebulletin.org/minutes-to-midnight/timeline.html>。

^⑤ 中国相关法规建设和实施，参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法规标准的编制和修订》，

散行为。今后，中美双方在防止核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仍有进一步拓展合作的余地。

（二）边缘行为对核禁忌的损害

禁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规范。如果有人试图直接对抗禁忌的核心内容，他往往会因为面对社会压力太大而不能成功。可是，一些边缘行为并不直接对抗禁忌的核心内容，因此容易会被社会忽视从而潜滋暗长，其长远后果是给禁忌造成严重伤害。在核禁忌问题上，边缘行为包括发展小型的、容易使用的核武器以及发展常规的战略打击武器。目前，这两种动向在美国都存在。美国关于核钻地弹的动向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①究其根本，就在于发展这种小型的、立足于使用的核武器会损害核禁忌，伤害中国核战略的基本假定。美国 2002 年发布的《核态势审议报告》则宣示了其发展常规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政策。^②这是一种危险的政策，会模糊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的界限，降低人们对核禁忌的信心，从而损害核禁忌。

（三）对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辩护可能损害核禁忌

对核禁忌的损害还来自于一些貌似学理性的探讨。这些探讨完全漠视核禁忌的作用，对核武器的作用进行随意的假定，例如，假定核武器国家在常规冲突失败之后必然使用核武器挽救战局。在中美之间进行的各种类型的核对话中，美国学者常常对中方进行这种“学理性”的说服。其出发点是为美国不承诺“不首先使用”进行辩护，但是，这种所谓学理性的宣传客观上有损于中国学者对核禁忌的信心。

冷战期间，国际反核运动强化了核禁忌。^③冷战结束之后，由于美苏间的大规模核对抗基本结束，国际反核运动的草根层影响力有所减弱。这对于继续维持和强化核禁忌是不利的。中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应该投入资源，宣传核战争的危害，反对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强化核禁忌。

五 战略互信与沟通

中美在核武器领域建立战略互信，这可以消除疑虑，减少双方的负面互动。目前，中美在国际核不扩散与反恐中的合作促进了两国间的战略互信。在核不扩散领域，中美之间有很多富有成效的合作。其中主要的合作如下。

（一）促进《核不扩散条约》无限期延长

1995 年《核不扩散条约》审议会原本可能陷入核武器国家互相指责的局面，导致条约无法在会议上顺利延期。但是，中国、美国以及其他核武器国家在促进该条约无限期延长的问题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国第一次向无核国家补充了俗称的“积极安全保障(positive security assurance)”，即向受到核袭击的无核国家提供援助；美国也向无核国家补充了有限的“消极安全保障(negative security assurance)”。这些向无核国家做出的让步促使无核国家同意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条约》。在这次合作中，中美逐渐建立了相互的信任。

（二）在防扩散机制建设上的合作

<http://www.chinansc.net/mainworks/fqgbzbz.htm>。

^① 例如，外交部军控司刘结一司长批评“更易于在战场上使用的小型核武器”，参见刘结一：《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国际防扩散展望与中国的政策》，2002 年 11 月 14 日，华盛顿，

<http://www.fmprc.gov.cn/chn/wjz/zjq/jks/cjk/1146/t4810.htm>。

^② Donald H. Rumsfeld,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Forward,” January 2002,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Jan2002/d20020109npr.pdf>.

^③ Nina Tannenwald, “Stigmatizing the Bomb —— Origins of the Nuclear Tabo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4 ,2005, pp.5-49.

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化学武器公约》履约、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制度与技术的发展、出口管制、追踪非法贸易等防扩散问题上，中美都有实质性的合作。这些合作不仅有助于双方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而且，也为双方在沟通上创造了人员上的、制度上、技术上以及语汇上的条件。

（三）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

布什接掌政府之后对朝核问题采取了简单、强硬的政策，使得该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困难；朝鲜后来的核试验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挺身而出，刚柔相济，主持了朝核问题的多边谈判机制。美、朝逐渐接受了中国关于谈判解决的思路，使得问题朝向解决的方向逐渐过渡。中、美之间在这一过程中有密切的、卓有成效的合作与沟通。这一合作还使得中美建立了对地区性防扩散进行合作的信心。

目前，中美两国在核不扩散合作方面也面临一些问题。中、美都需要根据对方的不扩散政策来判断对方战略武器发展的意图。例如，中国可以根据美国的不扩散政策来部分地解释美国发展导弹防御政策的动机。可是，美国在处理印度核问题上的态度却显示出美国对核不扩散问题未必是真诚的和一贯的。目前，美国与印度的核合作还有很多变数。中国方面有必要对美国的这类不扩散政策进行考察，由此判断美国的战略意图。

总的来说，中美在核领域的对话渠道比建交前后有了明显的增加。这些对话有助于澄清误解，避免核领域的误判。可是，《考克斯报告》对中美在核领域的对话带来了极大的伤害。美国一再声称《考克斯报告》的影响已经不存在了，而事实是，由《考克斯报告》所推动的针对中国科技人员的签证障碍有增无减。这种签证障碍对中美核对话已经带来了妨碍。

一位中国军方学者也指出了中国方面在核交流方面的障碍。他认为，中国的核战略及其研究过程应该更加开放和透明，过分保密源于不自信。^①

六 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目前中美在核领域的战略稳定性做出如下的判断。

第一，美国的一些战略武器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压力，中国仍有可能采取较低成本的应对措施来维护自身战略报复能力的有效性。因此，美国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对中国进行核威压的新资本。可是，美国所发展的一些新战略武器技术在明晰性上与核武器有很大的不同。核武器的或然性小、后果容易推断。因此，仅包括核武器的战略稳定性容易得到决策者的理解。在美国引进导弹防御、外空雷达等因素之后，战略稳定性考察的不确定性增大。这给中美双方的战略计算带来很大困难。美国决策者有可能盲目自信，从而增加对核威压的兴趣；中国有可能被迫为未来战略武器发展留下更大的余地。美国的一些大型战略武器发展计划也可能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技术发展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美国和中国都有必要对此谨慎从事。美国应该认识到技术垄断不可能长期保有；而中国需要对美国式的“大跃进”保持警惕。

第二，目前，核禁忌面临一些挑战，这会对中国的总体安全环境以及核战略的基本假定带来损害。美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核钻地弹这类用于打仗的核武器会损害核禁忌，全面颠覆目前的国际核观念，这对美国也是不利的。中国需要在维护核禁忌上发挥带头作用，对试图挑战核禁忌的言论和行为进行严厉的批判。

第三，中美在核不扩散、防止核恐怖主义等领域建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这对于维护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能够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美、印核合作可能损害美国核不扩散的形象，损害中国对

^① Yang Chengjun, "More Transparency Will Benefit the PLA," *China Daily*, September 27, 2007. p. 10.

美国的信心，美国有必要对此予以弥补。中美在核领域的沟通方面总体有所进步，也面临一些挫折和困难。从消除误解、增进稳定的角度来看，仍需更多的努力。

[收稿日期：2007-12-04]

[修回日期：2007-12-21]

[责任编辑：谭秀英]